

一个母亲与儿子的密谋

小时候，妈妈是那么喜欢同我一起出去散步，她经常这样邀请我：“喂！儿子，我们一起做一点儿咱们还没有忘记的事情吧。”她那么喜欢同我一起去湾湖喝咖啡，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驾车同往，记得妈妈说她懒得徒步走三百米到汽车站。每当在她的启发下，我说自己很快乐很幸福的时候，她的脸上都会焕发出无限的光彩。现在回想起来，妈妈除了想要看到我快乐之外，已经别无奢望。她不停地为我们计划，为我们忙碌，而且对此毫无意识，正同当时我也毫无察觉如出一辙，或者说我们都认为这些都属于天经地义的常规。当然妈妈的操劳常常会博得我愉快的反应。

她那么热衷于同我谈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希望我能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更轻松、更顺畅。她一直在担心，好像还有什么忘记了告诉我。据说在她的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人启发帮助过她。

可最后的结果是，她痛苦的情感使我极为压抑，我因此就伺机逃跑了事。

当我渐渐长大成人，对人生获得了足够的感悟与认识，非常希望能像妈妈千百次地抚摸我的头发那样，也深情地抚

摸一下妈妈的头发时，可惜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同她一起再去湾湖喝咖啡，一起去散步，渴望再听到她的声音……

作为儿子，我的任务是拯救妈妈的精神世界，是妈妈把这副担子放在了我的肩头。

就像我们两个双双落入了一口陷阱，而妈妈又没有能力把我们俩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妈妈也是对我的生活道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惟一女人，我曾经无可保留地依赖于她，她在我的生活中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

我不由自主地常常会同别人提起我的母亲。我绝对没有抱怨她的用意，至今想起她的困惑、她的痛苦、她无边际的孤独，直至她倍受折磨的死亡，我心中还会感受到一阵阵的眩晕。往事的回忆使我烦闷，让我心乱。在这种时候，我头脑中的念头只能是：她是多么不幸福啊！

她留给我的遗言中写道：“万事如意，留下我，一个母亲对她的孩子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好祝愿，在这一祝愿之中，我首先希望你生活在宁静之中；这种宁静的感觉我曾经体验过一次，那就是在去年的圣诞节。”这些年来，我一直把这张纸条夹在我使用的日记本中——我们大家都在相互频频祝愿的宁静的感觉，在她的心灵之中仅仅才感悟到一次。

今天，在我非常感伤地悼念自己母亲的同时，对她的行为又不可能完全苟同，因为这涉及到我需要如何认识自己现状的人格准绳。在我身上所体现出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根须，在这个父权宗族社会中我表现出的所有男人的弊端，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种种言行举止，都是在与妈妈共处的经历中滋生蔓延而来的。

因此我感觉自己有义务、有权利把我们之间亲近的经历与情感，襟怀坦白地告诉读者。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已经数年之久了，她的一生遭受了许多折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做出了许多奉献与牺牲。当她在世时，对我的一意孤行即刻会采取抵制的态度；现在，我又要采取措施解放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她已经无法反对了。

那么，她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视野里，还保存着一个清晰的形象吗？

伟大的母爱，在她活着的时候就使这种伟大的母爱达到了圣洁的境界。这种毫无代价、毫无条件、具有无限源泉、使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为之激动的母爱，难道可以任凭我们随便褒贬、评价吗？

母亲热爱自己的丈夫，热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妹妹和我，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她赐予我们宝贵的生命，当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她马上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我作为她的大儿子，她甘愿为我奉献自己的生命，但这种奉献对于她，对于我来说，呈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方式。

由于她一直在否定着自己，因而她对于自己没有献出足够的爱心。在这种情况下，在她对自己生活道路上的困难尚无法克服的情况下，难道她真的能够保证我的生活健康、进步吗？

在海曼·荷丝的诗句中我发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情感：

在温暖的草地上，
我愿意仰视云天，

合上我疲惫的双眼，
窥探我梦境的天园，
冥冥之中有人把我带到母亲面前。
啊！她早已察觉到我的脚步，
悄无声息地迎了上来，
我千里迢迢，风尘仆仆，
是为了把自己的面颊、自己的臂膀
静静地依偎进妈妈的襟怀。

——《对母亲的梦想》

我有许多的话要对你讲，
我已太久流浪于异地他乡，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之中，
还是你最能理解我，守在我的身边。
我有一件礼物，
她在我脑海中已经旷日久长，
伸出自己孩子般胆怯的双手，
示意你闭合我的双眼，
剩下的是我的感觉，
像童话故事一样，我的痛苦都奇异地消失。
是你无限仁慈地存在，
用千丝万缕的柔絮，
温暖地包裹住了我的身体。

——《我的母亲》

每当我在书中读到、听到人们谈论到关于母亲的情感，

自己的心灵就会一次次地受到触动，以至流泪。这些泪水流淌出的不仅仅是对母亲故去的悲伤，它们也夹杂着浪漫的神采，夹杂着我自怜的感情以及对于一个真实母亲的渴望。因此也可以说我还没有能力最后把握住母亲对于我心灵深处所形成的无以取代的影响力。自己的认识尚未成型，怀疑就已经萌生了。

一九六九年，当我开始着手理顺自己的个性与历史时，毫不奇怪，我对于审视的对象父母要进行一番谴责。比如说，我以前就限制过妈妈同我女儿的关系，因为在我看来，妈妈对于我女儿过于专制。妈妈的反应当时很固执，她坚持不再主动地同孙女接触了，其态度是：或者是继续以她认为正确的教育方式教育我的女儿；或者是从此再也不管了。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搞社会新运动的大学生们，对待自己父母还不够耐心与友好，实际是比较严厉与偏激。而当时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也是这种态度。那时我们对待老一辈人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或者说我们对待人生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总之是没有处理好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心理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与对话，我的观念逐渐渗透进了自己的感情，进入了母亲的内心，也融入了我同她交往的方式之中。母亲的形象朦胧起来，在彷徨之中，陈旧的家庭相册中那个金发的爱娃（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给予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渐渐转变了对妈妈的态度，以一种敬爱的态度来对待妈妈了。我在自己博士论文前面的献辞中对妈妈给予的耐心、周到、富有牺牲精神的照顾表示了感谢——“没有妈妈的照顾，我的这篇论文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当妈妈读到我的这段献辞时，她竟然

发出了那么撕心裂肺般的长叹，使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来也没有明明白白地向妈妈表达过这种谢意。

在当时来看，我还自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观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价值，自己献辞的方式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等我明白，她之所以喊叫，是因为她多年来苦苦期待着的反应，即我的赞扬，终于有所表示时，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母亲的喊声之所以如此凄厉，是因为在那一瞬间，她意识到自己企盼的一种承认，已经遭受到了多么深重的挫折，她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痛苦。有一次她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去期望一件事情。如果没完没了、徒劳无益地企盼，到头来事情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对女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的选择或许正是因为自己在此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经历。

人们习惯于回避争执、相互谅解的传统处世哲学，对此我是持批评态度的。我们相互争吵，并不等于存在分歧。越是很看重、很尊敬的人，我越是不愿意同他们回避矛盾；越是对我很重要，或者说是我对于她（他）的生活涉足颇深的人，我越是愿意向她（他）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她（他）越是坚定地抵制与驳斥我的意见，我们的争执越是激烈，我越是会获得极大的快乐。我知道自己有时候显得咄咄逼人。每当对方采取了回避的姿态，我都会感到十分沮丧。为此，我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同自己的父母对话，畅所欲言，不要错过他们可以听我们讲话的机会，我建议孩子与父

母之间可以开诚布公地开展所有的话题，这样做很少会伤害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交谈的问题极其严厉，那就应该使这种对话成为持续的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得到可喜的收获。

如果回避这种交流，不仅会剥夺老一代人的快乐，而且也使他们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如果我们同某些人不再对话，就无异于扼杀了他们一部分的生命，就等于让他们走向死亡。同父母对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力量与锲而不舍的品质，同时也少不了谨慎与耐心，事情不可能每每奏效，尤其最初的尝试是很难进展顺利的。

在我对于人生、对老一辈的关系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理解时，父母就已经先后谢世了，我也就不可能同他们一起，在亲密的氛围中去进行这种历史性的研究工作了。

现在，我只好尝试着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去跋涉那些逝去的岁月。尽管我也担心自己可能会出现种种偏差——比如我的思维模式可能趋于理想化，自己的批评态度可能流于抱怨，自己的评价也可能有失公允——但我感觉，要去啃这个酸果子也是我的“在劫难逃”。

在我心绪迷茫之际，我常常会渴望妈妈会死而复生，再告诉我一些机密。

别无选择，我只好潜遁于过去的朝朝暮暮，淡忘现实的浮躁与喧嚣。在逐渐沉寂下来的感悟中，我一直认为多此一举的内疚感突然显现得异常强烈了，我认识到自己耽搁了许多许多重要的事情。以前，每当我离开母亲的时候，她总是让我看到她的孤独与寂寞。而我的心情相反却很愉快，或者说这也算作很残酷吧。我回想起，每当这种时候她常去找一

位周游过世界的邻居老太婆攀谈，这个老太婆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活像是一个魔鬼。

心情好的时候我又觉得，过去耽误的事情我还能一一给予弥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嘛！由于妈妈的亲昵，我常常同她的关系过于亲近。因此我知道，如果把一个孩子的行为归结为冷酷，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诗人荷丝的情感，我还无法完全苟同，我并不认为妈妈在方方面面对我都最为理解，也没有感觉到她“无限仁慈地存在，用千丝万缕的柔絮包裹住了我的身体”。实质上我清楚地看到了母亲那种令人怜悯的，对父亲的依赖情绪，看到她同自己忧郁生活的苦苦抗争，以及没完没了的、充满敌意的翘首企盼。至于她在生活中一味地溺爱我，这并非是一件好事。早在她精力还很充沛的时期，我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母亲是一个个性极不和谐，充满矛盾的女人，她常常表露出异常的热忱、慈爱，而且对人体贴入微。

在我还刚刚步入少年时期，她就会常常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话，并参与介入我个人的生活范围。她帮我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讲出一些冷静而睿智的语言，为我指明前方的道路，伴随我度过苦闷的时光，对付那些麻烦的困难，理顺许多人际交往方面的烦恼。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却很难接受挫折，情绪上常常会表现出极其夸张的波动，甚至如殉难女英雄一般气急败坏的反应。早在我三岁的时候，她就会曾经把我看作不可教诲的东西威胁过我，使我逐渐产生出一种对外界社会的巨大恐惧感，并想方设法地抵制与回避同其他人进行正常的交往。父母每每要带我去这儿、去那儿做客时，我当时几乎是一概拒绝的。我当时很肯定，自己已经把经历到的

所有感受都告诉妈妈了。然而当我在教堂举行按手礼时，她却对神父说：这孩子在家里什么也不说。我听了这句话感到无地自容，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莫大的误解，我想我也许就是那么一种无法理喻的孩子。从那以后我真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我孩提时代的所有回忆中，妈妈都占据着无法取代的重要位置。记得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同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一块吃饭、睡觉，她在两天之后就把我领回家了。也许是我在“俄国”的大街上挥剑举盾，为了抵抗德意志的入侵，或者是由于我对一个小女孩说“这件事你不用对妈妈说”，而被母亲视为性格中的弱点，让我发誓保证，一定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就当时来讲，我根本不会说假话，也完全没有能力不去做母亲要求我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不可能不守在她的身边。如果我独自做了某项决定，在我看来就等于我离她远去了。

我被溺爱的同时，思想也非常简单，那时人们把这种孩子称为乖孩子；而不驯服、不在家长面前和盘托出的孩子被称为坏孩子。可以说这也属于纳粹意识的残渣余孽吧。

小时候我曾反复地进入一个同样的梦境，梦中的情景相当形象地表达了我内心对妈妈过于亲近与过于依赖的不安与惶惑——茫茫人海，我身居异地，心里一直想回家，等回到自己家门前，却发现门上醒目的姓氏标牌已经不见。我顿感惊恐不安，一句话也说不出，失魂落魄地来到大街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最后我认为，我一定是在做梦，就干脆在人来车往的街道中间躺下来。至此我每每会即刻惊醒，庆幸地

发现自己还躺在自己家中的床上。

我们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总反映出我们生活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在迷茫之中可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捷径，正意味着毫无理性的绝对信任；在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可以旋即回到自己温暖的巢穴，可以不假思索、异想天开、脱离现实。这些足已清楚地暗示出我同母亲之间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了。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孱弱无能、过度依赖母亲的孩子，对于纷杂的外面世界隐藏着多么强烈的畏惧。难怪有一句格言中写道：“不必恐慌，你的妈妈永远同你在一起。”

这是一段胆怯的经历，在那个时期，我本应对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对于母亲的回忆毕竟是越来越不甚清晰了。我当时种种困惑的情感，大多是无法表达明白的。我的勇气也是若即若离，心中常常升起某种羞耻的感觉，有许多曾经一度清晰了的观念，随即又被无法理清的迷乱、纷杂的心理搅得七零八落了。我尽可能地在这些零乱的往事中寻找一个恰当的焦距，当我想放松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时，我就用对亲人的怀念与伤感安慰自己。

那么，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作为母亲的丈夫他不能算作一个成功男人，因为他没有努力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反而去冷落母亲，随随便便地对待她，甚至排斥她。他不同母亲正常地交谈，即使她心灵出现危机、痛苦不堪的时候也冷漠地不予理会。倘若事情不这样，妈妈也不会在我的少儿时期占据了如此超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位置。由于受到丈夫的背叛与遗弃，妈妈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心态之下，把对父亲的渴求以及对她在爱情方面无能

为力的怨恨，都一股脑儿地转化为对自己儿子的关切之心。在对自己悠远旧事的回忆中，这种家庭的综合状况，可以为我树立观念与校正立场的一条准绳吧。

我父亲虽然不是一位酋长，但毕竟是一个代表族长制意识形态的典型人物。他不懂得如何交朋友，对我们孩子们也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关切之情。对我的妹妹可以说表现出了相对的耐心。可就我个人而言，从来把握不了他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心态。超出他的工程技术知识领域的事情，他一概显得格格不入。在他清冷的办公气氛中，他用不着讲什么话，因为与他为伴的无非是些机器、设备。父亲习惯的是把活人同收音机相比较，同机器相同的需求，他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满足。显而易见，一个渴求心灵解放的妇女，肯定无法叫这种刻板的男人满意的。他冷淡、寡言、阴郁地同我们拉开了距离。下午回家后他躺在自己的长沙发上读报纸，校正图纸，或者是埋头大睡。为在学校取得较高的分数，我有时帮助他修改图纸。但大多数情况下，他要求安静，支使我走开。他对我的一言一行都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我做的每件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在磨磨蹭蹭。

事到如今，我的宠物还是蜗牛。因为我需要不停地告诫自己慢一点，歇一歇。

“你，年轻人，一点都不麻利。”

父亲常常这样指责我。不用说，我以后就根本麻利不起来了。这种断言就像心理医生的诊断一样残酷无情，因为这样断言的用途只能是使被训斥的人失去了自信，哑口无言。每次我用过父亲的圆规角尺，总是被责备用坏了某些东西。如果我讲述什么课程时，父亲就会说：“怎么这么笨啊？”并宣

拉着脑袋离开房间。本来这些知识都是我在学校里常常被人夸奖的科目，而在父亲面前，我所做的一切，他几乎全都嗤之以鼻。

听起来好像我有些夸大其词了。事实上，尽管爸爸的不满与牢骚也不可能完全打消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亲近愿望。真正使我同父亲之间产生疏远、间隔的人是我的母亲。她经常在我面前对父亲说长道短，抱怨诉苦，使父亲根本没有机会同我进行深入的接触。

妈妈绝非完全处在被动的牺牲品的地位，比如我就很相信母亲，从来不把母亲对父亲的评价透露给父亲。因此，我渐渐有意地回避父亲，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很不情愿地去征求父亲的意见。妈妈阻止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接触，虽然她是无意识而为之，但其态度却极其固执。等我逐渐长大了，父亲很想给我传授一点生活的哲理，或者尽一点长辈的忠告时，因为对我了解很少就显得相当勉强。他对我说：“一个不可能同你结婚的女人，就绝对不要同她睡觉。”——一种性交往戒律的老生常谈，一种流于敷衍的生活教诲。

由于受到母亲的欲望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强烈感染，其儿子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着显露诱惑的蛛丝马迹，他渴望着每一个女人怂恿自己的眼神或信息。一旦某一个女人同他经历了一次亲密的交往，他就会想入非非地期望着对方毫无限度地满足自己一个又一个欲望。就我目前的生活经历完全可以证明，这种偏激的心态正是主宰我心灵世界的一条主旋律。

我的心态渐渐变得十分冷酷，否则我感觉自己正在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因为对于母亲在感情方面的种种需求，我

根本就无法满足；因为我没有碰到任何人鼓励我，把心底这种无谓奉献的感觉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我只好把这种难以言表的心灵创伤苦涩地吞下肚去。就这样，作为一个男人，我终于有一天同与自己的生命情感交往极深的女人生撕活剥地拉开了距离，因为这个男人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感到了生命的危机。

我的这种心理斗争，在外面的现实社会中继续延续着，继续抵制着母亲对我根深蒂固的影响。母亲赋予我的重负是：把她从孤独与百无聊赖的情感中拯救出来，后来她也曾经把这副担子寄托在其他人的身上。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扮演着这种随时可以满足其要求的惟一的角色。小时候只有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看到她徒劳无益地向我发出许多痛苦、求救的呼唤，使我的内心滋生出巨大的感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是多么热切地期望自己能够保护她，使她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啊！因为解脱她最压抑与最沮丧的困境，正是她向我表达的最殷切的期望。她常常来到我的身边，抓住我的胳膊，脸上变幻着扑朔迷离与慈爱的神情，信誓旦旦地道出母亲心中最核心的宗教信条：

“我们俩！”

当最虔诚的信徒们看到自己的教主受苦遇难，或者是需要证明教主的大慈大悲时，他肯定就是以这种神情祈祷的。母亲把我无以保留地拢进了这种温柔而痛苦的撞击之中。

“我们俩——难道不是吗？”

这是一种教会中的仪式，它通过器官与心灵的亲密接触，把在场的信徒魔幻般融合为了一体。在这种庆典的时刻她会向我表现出无限的理解，使自己成为我的一个姐妹。据

她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付得了外面这个罪恶的世界。她的丈夫、她的父亲、她的姐妹、她的公婆——实际上是没能偶然，或者说临时地被划入我们这个堡垒，这个远离世界的痛苦与怀疑的碉堡的所有人——都被母亲圈在了自己制造的神秘氛围的圈子外面。

乔治·希蒙斯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使读者感受到他那种非常难以后齿的复杂心情。对于男人的不幸境遇，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真实可信的见证人了，世界上的每个男人都很难从这种可悲的困境中把自己解脱出来。

“实际只涉及到我们两个人。”

他尽可能用谅解的口气斟酌文字，似乎是在安慰自己的母亲，而且恐怕自己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他在去世之前不久，坐在自己的病房里，企图尽可能用委婉、平和的态度审视一下心中强烈震颤着的、难以平息的回忆。同母亲相关的许多往事，还重重地压在他自己的心头，终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从他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幼稚的儿子所蒙受到的不必要、不公平，甚至是残酷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是他毕生都无力承受的。

“我并不为此生你的气，”他写道，“我回忆这些往事没有记恨的意思。我并非在谴责你。”

希蒙斯的书信没有转达到他母亲的手中，这就像弗兰茨·卡夫卡给他父亲写的那封“因为父亲而生病”的信一样，永远也不可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因为他们不敢交给本人。

恰恰在希蒙斯的书信完成后才几天，他的妈妈就去世了。应该说这绝非巧合。

如果我的母亲能看到我现在的书中所云，我也会感到这

是对她十分残酷的打击。

为什么世界会是这副样子呢？

我们做儿女的，还不可能把心中的烦恼坦率地面对父母讲明白，而不在乎他们如何勃然大怒。我们的战略通常是避开主战场打一些游击战去骚扰父母的麻木，用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对于最尴尬的深层问题却始终持回避的态度。我想大家在心里主要是担心，亲情双方的关系破碎到无法收拾吧。

我真想说一说，由于母亲对我寄予了太多的企盼，向我会曾经陈述过许多自白，但事实上这些往事我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宁愿保持沉默，宁愿把这种无法消化的感情生吞硬咽进肚子里。

谁让我当时承担了妈妈可以惟一信任的那个角色呢？又有谁能说清楚，世界上曾经有过多少孤独的女人，盼望拥有一个能担任这种角色的儿子呢？只有在这个人面前她们才可以毫无顾忌，可以倾心地信赖。比如说在我对男女之情刚刚懵懵懂懂的时候，她就向我十分神秘而伤心地讲述爸爸在生活上的一些不轨行径。比如她说自己曾经在父亲的外衣口袋里发现过避孕套。母亲满面泪痕抱怨的结果，是使父亲的耻辱转变成了我内心的郁闷。我还没有胆量同父亲面对面地讲明此事，只能使自己的思想受到制约。是母亲把这颗必须在别人面前保持沉默的种子，播进了刚刚形成尚无决断能力的孩子心中。

“就我们两个知道，绝不要同别人说。”

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搅进此类龌龊的纠纷，是多么残忍的行为，母亲怎么会如此坦然而为之呢？

就当时来讲，我的心中不仅滋生出了一种对芸芸众生皆在造孽的蔑视之情，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忍辱负重的尊严，自认为只有我们两个才可以问心无愧地感到自豪。

世界上有多少个母亲都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丈夫的种种不如人意，她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大多源于被疏远的感觉，母亲当然并不例外。

我个人尚无能力去考察这种现象的真实性与普遍性，也无法判断自己的母亲是否同大多数人有什么例外。妈妈并不对我说假话，她当时的行为举止也非属鲁莽之举，只不过是她非常孤独，而我又是她惟一的“倾诉”对象。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我们两个人简直享受着自己就像约瑟夫·基督受到审判时的感觉。这种审判是在无被告的情况下进行的，约瑟夫不接受任何为自己申辩的机会，没有理会被告讲的任何诺言。他无限疲惫地在那些并不存在的房间里茫然踱步，不接触周围人的眼睛与耳朵，绝对不寻找自己的支持者。约瑟夫·基督被判决，人们捉住了他，因为人们每时每刻都想监督他的行为，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做点什么的会。

我理解约瑟夫的处境。可我本人毕竟是个善恶兼备的凡人，我享受了这种圣洁的感情，以什么样的付出作为代价呢？

从母亲的表现来看，她一定爱上过我，我在她恐慌的心灵中清楚地发现了安全的领地。我曾经感觉母亲百般地迎合我，也可能是我的年幼无知，使她发出了坚定不移的宣誓礼仪，对于妈妈的儿子们来说，这种礼仪的苍白无力是极具典型特征的：

“我不批评你，因为我需要你；我不会欺骗你，因为我害

怕你离开我。对于我，你也可以放心地信赖，我只关心你一个人，而不可能去为其他人操心。只要你感到幸福，我就会非常满足了。”

然而，她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即使她产生了这种情愿受虐的念头，还是对她无所助益的。除此之外她在生活中别无快乐可言，常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以泪洗面。在这种时刻我们是分开存在的，但仍然是在同一所宅子中。在情感方面我们更是牵肠挂肚地无法分开，她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抽泣声从门的缝隙中传进我的耳畔，使我极为压抑，坐立不安，我承受着巨大的恐怖，生怕她会从窗口坠楼自杀。她铭心刻骨的叹息声，表达出她不愿意再生活下去的绝望，折磨着我的心灵。记得我在十一级学年读书时从三里地以外慌慌张张地一口气跑回家，眼前不断地浮现出她生病躺在床上想要用某种方法自杀的景象。她可能并非希望我这样担心，但实际的结果却恰恰如此，使我处在了良心的不安之中。

她的一生实际只得到过一个人的真爱，那就是她自己的母亲，只有一个人的爱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况且外祖母也早就过世了。因此她当时把我作为惟一的人选，重新组合形成了这种无法满足生活的、不存在第三个人的两人世界。至少在我离开她就无法生活的时期就是这样。在我可以自立时，她仍然向我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与忧虑。因此，如果我现在碰到困难或者是同生活的女伴在一起时，对于第三者介入都表现出友好的欢迎姿态，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与参与。在我小时候，母亲不愿意向其他人倾吐自己的苦闷，可其他人在场，或者是第三者的参与却常常使我感到忘乎所以的轻松、愉快。